

# 在國史館服務雜憶\*

陶英惠\*\*

## 一、我到國史館服務的經過

我是由《新時代》雜誌社轉到國史館工作的。到國史館去，是由臺大同學劉鳳翰兄，轉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聿均先生致函國史館許師慎主任秘書介紹的。王聿老雖為介紹人，但他在為我寫介紹信時，尚未曾謀過面。其隆情厚意，永遠不敢忘記。王聿老是羅家倫館長任中央大學校長時的學生，曾替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撰寫《國父年譜》初稿，所以在羅先生前講話很受重視。

民國50年4月7日下午，羅館長約我去面談。他非常尊師重道，每在約談新進人員時，總是要詢問師承，他說有些人竟然不記得過去老師的名字，太不應該。我對各授課老師的名字，都能一一作答，尚蒙嘉許。惟在獲知我的畢業論文是吳相湘教授指導時，便再三追問我與吳老師之間有何權利義務關係？羅、吳之間過去有些不愉快，是眾所皆知的事；但我認為那是他們老一輩的恩怨，與我們晚輩無關，乃據實答以師生關係至為單純，有事弟子服其勞而已。羅先生又追問吳

\* 民國95年10月19日，國史館簡筌篴處長電告：明年為國史館在臺復館50週年，今天看到我的一本小書，藉知我曾在國史館服務過三年，擬請我口述一下在館工作時的情形，作為紀念。這對我是一項莫大的榮譽，同時也義不容辭，即欣然應命。惟因適有瑣事羈身，竟抽不出一個比較適當的時間接受訪談，而所作的承諾，似又不便拖延太久；遂利用晚間空閒時，就記憶所及，將40多年前在館工作的經過，稍加整理，草成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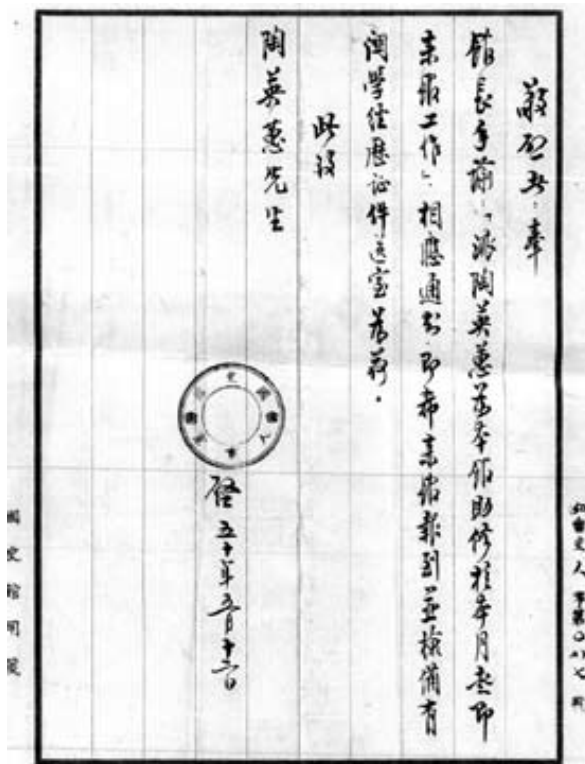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民國50年5月16日至民國53年6月25日任職於國史館。

老師與《新時代》雜誌之關係，答以吳老師僅為特約撰稿人，並無待遇，也無車馬費。但他總是語帶懷疑，認為我有所保留或隱瞞。所以談的有些不快！臨辭出時，羅先生囑將畢業論文送他審閱。我在論文末有感謝吳老師指導之語，為了表示坦誠，也就照原樣寄去。後來聽說羅先生為那天的談話感到有些抱歉！

羅先生在看完我的論文後，又於民國50年5月2日下午召我去談了很久，謂只要在《新時代》之手續辦理妥當，隨時可去國史館報到。這表示他對我的論文還算滿意，但有三點評語：(1)尚稱通順；(2)不夠細心；(3)不夠老練。他已仔細批改過，指出有五、六處錯字，有些是校對的疏忽，也有用字欠妥當處。使我獲益良多，至為感謝！羅先生所改動的地方，當時沒有記下來，非常可惜！他並再三以多讀點書、好好充實自己相訓勉，殷殷至意，十分感人！自忖學歷史的人，能到國史館工作，恰可學以致用，應該是一條正確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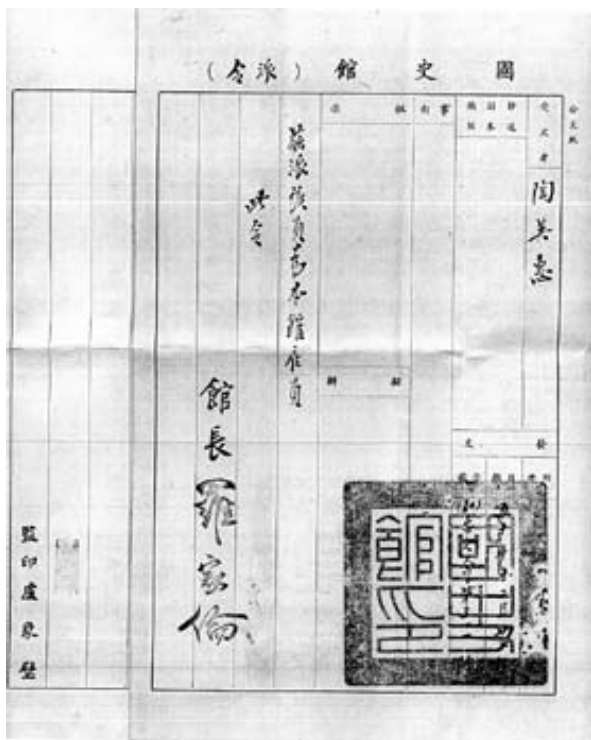
民國50年5月12日，接到國史館的報到通知書，管人事的陳鈞廉先生誤書我名為「陶英蕙」（在「惠」字頭上長了草，看起來更女性化了）。職務名義為「助修」。當時館裡的新進人員，多為「練習生」或「雇員」，然後才能升助修，我一去即委以助修，真有些受寵若驚。

民國50年5月16日下午，到國史館報到。臺大歷史系同班的熊守暉兄，已先



●派任助修函

(陶英惠 提供)



●派任雇員令  
(陶英惠 提供)

在國史館工作，由他帶著辦理各種手續，並介紹與各同仁見面。到館後，才知道由於我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不能任助修。我為了取得任用資格，曾於50年9月1日至3日參加高考。11月28日放榜，落榜，故仍無法取得任用資格。同年12

月22日，奉批改聘為「雇員」，至此才正式成為館中的一員。

記得參加高考進考場前，剛背了一條憲法條文；試卷發下後，有一題正是要寫出我剛背過的那一條條文，不免有些暗自高興，即先就此題作答，不料竟記不起原句，因為憲法條文與一般文字不同，很難記，雖百般苦思，仍是枉然。只有擲筆而嘆，這樣的題目都答不出來，怎能考得取！不得不從此放棄高考一途。

## 二、在館工作概況

國史館當時主要的研究工作有兩項，一為開國實錄，一為抗戰實錄。開國實錄似由纂修陸徵祺老先生負責，聽說還有一位非常資深的纂修（似為劉壽朋先生），但我從未見過，似乎年紀太大了，已無法到館上班。抗戰實錄則由柳長助纂修負責。我即在柳先生的指導下蒐集、整理抗戰史料。

柳先生指示，抗戰實錄涵蓋的時間，是從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

起，至34年日本投降止。而民國20年6月，在吉林省長春縣的萬寶山，韓民為租種田地、挖掘水道、毀壞我農田，雙方發生之衝突，史稱萬寶山事件，此懸案未結，而九一八事變爆發。所以我就從萬寶山事件開始，著手整理有關史料。

當時國史館館長和黨史會主任委員都由羅家倫先生擔任，兩個單位的資料調借非常方便，羅館長將民國20年至34年在大陸時期的各種重要報紙和期刊，都自南投草屯的黨史會調到館裡來，記得有《東方雜誌》、《國聞週報》以及各地的《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上海的《時事新報》、《新聞報》等，我差不多都翻了一遍，收穫非常大。一般諷刺公務員上班為喝茶、看報、聊天，而我的「看報」卻是正經的公事。

初到國史館，感覺到有點官衙的味道，最明顯的就是辦公桌的大小：館長的桌子當然最大，在行政體系依次為處長、科長、科員；在研究系統依次為纂修、協修、助修，我以「助修」名義應聘，因為沒有任用資格，再改為「雇員」，辦公桌自然是較小的。各級職的桌子，尺寸大小分明，從桌子的大小，就可看出你在館中的職級高低。與我同室工作的，尚有五位抄寫人員：張維幹、魏繼漢、許林、鄧榕生四位先生及陳秀芳小姐。他們是按件計酬的臨時人員，由我在報紙上勾選有關抗戰的史料，分給他們五位抄繕；那時沒有影印機，更沒有電腦，成本最小的唯一辦法就是抄寫，而且要墊著複寫紙複寫三份，相當吃力。又因為他們的職位最低，所以桌子也最小，大約是50×60公分，那時從草屯黨史會調來的報紙，如《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等，都是精裝的，他們要抄寫時，必須完全打開，但是打開報紙後，比桌面還大，根本沒有抄寫的地方，只有用克難的辦法，另外找個不用的椅子，放在桌旁用椅背架著報紙，騰出一小塊地方抄寫，非常辛苦！所抄之件，則聘請中央日報社校對科的人在公餘來兼差代校。我記得有一位是陸宗澄科長，他來校對時說，在中央日



報社做校對非常不容易，絕不能出一點差錯，特別是在敏感的政治字句方面，即使是無心之過，也不能原諒。所以校對科長的下場，很少沒有被收押、訊問過的。因此，他們都養成了戰戰兢兢的工作態度。我們的抄件，經過他們校對後，便很少有錯。

### 三、借調開國五十年文獻會

到國史館大約一、兩個月，即和熊守暉被調至仁愛路2段9巷27號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輯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文獻會之成立，是黨政機關為了紀念開國五十年，藉由編印文獻，刊布正確的史料，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外學者參考。由陶希聖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羅先生為副主任委員。會中的基本成員，多半是陶主委的同鄉、親戚或僚屬，如秘書阮繼光先生，好像是陶主委的外甥，他的字寫得又快又好，陶希聖先生代蔣中正總統所撰的《蘇俄在中國》一書，阮先生對我說他曾謄抄過好幾遍。每改一次稿，他就要謄清一次，而且都是急件，日夜趕工，十分辛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專員高蔭祖先生任執行秘書，在那裡坐鎮。我臺大歷史系另一位同班的李敖兄，也於民國51年2月應聘到會工作，我和熊守暉是由國史館借調來的，這時我們同班同學竟有三人同時在會中工作。館中同事認為我和熊守暉兄一定有額外補助費，實際上並沒有分文補助。只在中秋節時，羅先生以私人名義慨贈我倆每人500元。

### 四、生活小記

國史館那時在臺北市北平路2號，位於行政院後方，看起來有點像行政院的後門或門房。對面是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整天進出的車輛不斷，不僅噪音震耳，空氣中也飄浮著汽車所排出來廢氣的味道。



●攝於北平路國史館大門口  
(民國53年4月14日)  
(陶英惠 提供)

●攝於國史館辦公室門口  
(民國53年4月14日)  
(陶英惠 提供)



國史館的面積非常狹小，房間的隔間並未到頂，上面是通的，完全不隔音。史料處處長倪寶坤先生，脾氣很大，經常關起門來訓斥他處的同仁，其聲音大家都清晰可聞。總務處處長王藹雲先生，追隨羅先生多年，

在集郵界頗有名氣。上班期間，經常在電話中談集郵事，他的電話也時常影響到別人上班。大家都習以為常，沒有人抗議。據說王先生自知脾氣不好，所以他老太爺給他取了「藹雲」這個名字，希望能有所改善。總務處的唐元甫先生，是位書法家。他寫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樣，渾厚有力。人事室主任張公衡先生，好像是北方人；會計主任徐鵬志先生，眼睛大大的。我與他們兩位在工作上很少接觸，印象不深。我常去盧象璧女士那裡領文具，給她添了不少麻煩。

還記得一件有趣的事：孫葆科長好像是雲南人，過年時我們去他

家拜年，孫科長說，照他們老家的規矩，一定要招待去拜年的人吃個紅蛋，大概是討個吉利吧！我們也就隨俗每人吃了個紅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與我們同輩的藝術家陳勤兄，風度翩翩，英俊瀟灑，一副名士派的樣子。我們看到他常陪孫科長下棋，也並不以為意。直到民國55年6月5日在中國之友社吃他的喜酒時，方才醒悟過來，新娘子為孫科長的掌上明珠。



●攝於伊通街宿舍前（民國51年4月15日）  
（陶英惠 提供）

料處倪寶坤處長安排到館實習，畢業後去服兵役，服完兵役後仍回到館中工作。我倆多年同窗，一塊吃大鍋飯長大，現在又同寢共室，自然有聊不完的話題。不過沒

民國50年11月15日，我搬進臺北市南京東路2段120巷5弄15號（亦即伊通街59巷15號）國史館的單身宿舍，與員林實中的同班同學王宗義兄同一寢室。宗義兄是師大社教系畢業，被他的老師、國史館史



●作者與王宗義（左）合影（民國53年4月）（陶英惠 提供）



有多久，他就榮調經濟部了。宗義兄到經濟部後，一帆風順。退休後，常在老同學聚會的場合見面。他的健康狀況一向不錯，不料今年1月31日，忽然傳來以心肌梗塞逝世的惡耗，享年75歲。因春節將至，即於2月9日在板橋殯儀館舉行安息聚會，火葬後安葬於三芝鄉北海福座。

國史館宿舍是一樓一底的房子，徵校處長歐陽鶯（無畏）先生住我隔壁一間，趙慶鑒、陳鈞廉兩位先生住我對面一間，陸徵祺、姚漁湘、楊豔昌三位先生住在樓上。我每天與趙慶鑒、陳鈞廉兩先生騎自行車上下班。那時馬路上車輛不多，我自認騎車子的技術很好，經常因大撒把（即手不扶把手）而被趙、陳兩先生譏笑。我要和他們打賭，自宿舍上車後，可以一路撒把騎到國史館。他倆都是山東同鄉，而年長於我，大約是基於愛護我，怕因逞強而出意外，不和我賭。年少輕狂，有些舉動真令人不可思議！房東家有四個小朋友，也常和我玩在一起。



●作者與房東小孩合影（民國51年4月15日）

（陶英惠 提供）



在宿舍裡，我們有一個小伙食團，大家輪流做伙食委員。因為只有一間浴室，大家輪流洗澡。楊豔昌先生是甘肅人，高頭大馬，為人豪爽，我們稱之為楊老將，他說話有個特別腔調，對於「洗」和「死」兩個音分不清。每天吃完晚飯後，楊先生總是提高嗓門問：「誰先洗（死）？」姚漁湘先生身體很好，即使在冬天，洗澡也不用熱水，總是首先答他先洗。結果他竟真的先死了！民國52年8月25日，在臺大醫院以疝氣微疔住院開刀，竟於27日晨病逝，殊出人意料！

民國52年3月4日，國史館宿舍自伊通街遷到了新店鎮大崎腳銀河新村12號，也就是國史館現在的位置。那時房舍不多，我與趙慶鑒先生同住一間。趙先生愛整潔，床鋪及書桌都一塵不染，井然有序。我是邋邋慣了的人，所以感到很大的壓力。銀河新村的環境很好，就是距辦公室遠了些。每天要到新公園（現改為二二八和平公園）那一站去搭到大崎腳的公路局班車上下班，車子的班次不很多，浪費在路上的時間太長，殊覺可惜！

## 五、前輩風範瑣憶

羅館長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健將，他的文字，向以優美而具有豐富的情感著稱。我早就拜讀過他許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文章。例如他在五四那天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多麼簡潔有力！五四時在天安門帶頭遊行的照片，雄赳赳，氣昂昂，更是令人景仰！及至民國50年4月7日下午我首次和他面對面談話時，他已是65歲高齡了，第一個印象是和他那大氣磅礴的文章無法聯想在一起的。在握手時，我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的雙臂似乎比較長，手掌很大、很厚而且非常柔軟，據說有這種手的人是富貴命；可是說話的聲音則非常細小，即使面對面談話，也必須全神貫注，否則就聽不清楚。所以有些不是非他親自出席不可的會議，多半請歐陽無畏先生代表去參加。

大家對羅先生最好奇的，當然還是他和張維楨夫人的戀愛故事，有許多浪漫的傳說。那時羅夫人偶爾會到館裡看館長，我的辦公室就在一進國史館大門右邊的一間小平房中，每當夫人來館時，總不免好奇的想偷看一下。直到民國95年5月，羅先生的長女公子羅久芳教授送給我所著《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一書，才知道很多傳說都是以訛傳訛的。在該書的第5頁中，我發現羅先生竟然也會抽煙，書中記他在熬夜寫稿時，「煙灰缸裡堆滿了煙頭」。這使我瞭解到，一篇大塊文章的問世，是絞了多少腦汁的結果！我也曾抽過很多年的香煙，頗能體會出個中滋味。

羅先生的字，透著濃濃的書卷氣，別具風格，求他墨寶的人很多，每在累積相當數量後，便抽空揮毫，一次寫完。他要寫字時，都由他辦公室的傅桂梅小姐在旁磨墨牽紙。那時只要送上一張宣紙，附個名片，不管你的職位高低，或是否相識，羅先生都會替你寫；而且不收所謂的潤筆費。我曾為山東國大代表蘇文奇（子才）老伯求過羅先生的墨寶，就不知也為自己求一件。可能是當時連買張宣紙的錢都不寬裕！傅桂梅小姐是苗栗客家人，聲音非常甜美，我的同學在電話中聽過她的聲音後，都表示有餘音繞樑三日之感。

民國51年5月6日（星期日），國史館全體同仁參加北市國民義務勞動，羅先生也來到了現場，與每位同仁握手致謝。有的人手上滿是泥土，他就抓著胳膊搖幾下，並和大家無拘無束的天南地北閒聊。



●參加義務勞動（民國51年5月6日，最右一人之背影為作者）  
（陶英惠 提供）



●參加義務勞動（民國51年5月6日）

（陶英惠 提供）

●參加義務勞動，左起王宗義、徐鵬志、熊守暉、作者、徐漢斌（民國51年5月6日）

（陶英惠 提供）



我記得他說抗戰期間，看見一位小腳女子，在滇緬公路爬上幾千公尺之山頂打石子，從那時起便再也不敢談「雙手萬能」了。在聊天時，恰好有一輛拉木材的膠皮車經過，因為是上坡，非常吃力的樣子，有幾位同仁立即跑去幫忙推上坡。羅先生看到後，便用雙手在嘴巴前圍成喇叭狀高喊：「助人為快樂之本！」每個人的臉上，都堆滿了笑容。

羅先生記憶力特強，不料在晚年竟大為衰退，旋因罹患肺炎住院療養。民國58年3月12日下午，我與熊守暉兄一起到榮民總醫院探羅先生病，他已經幾乎全無記憶力了，由老洪（洪宴卿）在院裡陪他。許師慎主任秘書去時，尚能呼許先生。他的老友王世杰夫婦去，仍照



慣例隨孩子呼王夫人為王伯母，但已不記得王世杰先生姓什麼。我倆在醫院時，醫護人員正在商量如何治療脫肛事，須等下午羅夫人到後再決定開刀與否。為了怕打擾他養病，以後沒再去榮總看他。這年的12月25日，一代哲人，與世長辭，享壽73歲。29日安葬於陽明山公墓。

走筆至此，我的心情，正如羅先生在其〈印度國旗的制定和我〉文末所引用的那句：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柳長勛纂修是位湖南才子，中央大學畢業。有一次向我談起，他在教育部所屬的地理研究所（不記得正確名稱了）任職時，他中大的老師張其昀任教育部長。柳先生繪製了一本中國人文地理之類的地圖，送請張部長斧正。過了一段時間，張部長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並送了柳先生一本請他指教。我還記得他說這件事時的表情，兩手一攤，滿臉無奈！

民國58年12月9日，應柳長勛先生之邀去銀河新村一談。柳先生要我代為主編民國20至34年（即抗戰實錄所涵蓋時段）之中華民國大事記，我因本身工作太忙，無法從命。在談抗戰時期的軍事時，偶然涉及留德軍事學派的人物，柳先生非常推崇蔣百里，蔣百里以下依次為楊杰、徐培根，再就是柳先生他本人。他說這話時，充滿了自信、自傲！他又說，德國學派之特色為參謀制，統帥全聽命於參謀部，徐培根為副參謀總長時，柳先生適在國防部任職，且為重要角色之一。（經查徐培根：民國40年7月以陸軍二級上將任副參謀總長，8月任國防大學校長。44年9月，再任副參謀總長，至45年再任國防大學校長。我不知柳先生是那一段時間在國防部的。）後來因為蔣經國改行俄國制，以政工代替參謀部，徐培根及柳先生都下了台。柳先生說，徐培根未能升任參謀總長，頗為失意！

柳先生又將其自傳《一代風雲》之前四章抄本送給我讀，書中記述其生平所見、所聞、所識之中國人物，文筆流暢，充分表現出才華橫溢，頗多警句。不知後來是否出版了。

陸徵祺纂修，微胖不高的身材，面如彌勒佛，見了人總是笑咪咪的，非常和善。那時上下班要簽到簽退，簽到簿就放在一進大門左邊一個小房間的桌子上，人事處對於簽到簽退並未嚴格執行，每個星期一早上將簽到簿放在那裡，直到星期六下班時才收回去，大家可以隨時去簽。陸老先生則從不去簽，每到星期六時，就請在金甌商職就讀的工讀生李淑珍小姐，拿著他的圖章去蓋，一周蓋一次章，一次蓋一個禮拜的。李小姐很聰明，也很漂亮，大約是升學後離職的。

歐陽鷺先生，字無畏，江西興國人，為黃教喇嘛，曾在西藏多年，精研密教各大經典。來臺後，一度在政大邊政系講授西藏語文與西藏史。民國50年4月，應羅先生之聘到國史館任纂修，並兼徵校處長。我記得有一個學生常到宿舍來跟他學藏文。民國80年10月10日，歐陽先生不幸病逝。

姚漁湘先生是李敖兄臺中一中的老師，對民國史、特別是人物傳記資料非常熟悉。有一次羅先生面囑查「贊侯」的本名是誰？我請教姚先生，方知民國成立以來有兩個人字「贊侯」：一是黃鍾瑛，福州人，民國成立後首任海軍總長和首任海軍總司令；一是李思浩，曾任段祺瑞執政府財政總長。乃據以覆命。羅先生問我何所據？我答不出來，姚先生告訴我時，我就信了，也不知問其出處。這時被問得目瞪口呆，面紅耳赤，再回去問姚先生。姚先生說根據《民國野史》。我再去回覆羅先生。這件事給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課：學歷史的人，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根據的是什麼？可信不可信？而且以後再奉到交辦的工作時，不可以馬馬虎虎的交差，一定要敬業！羅先生在知道根據的是《民國野史》一書時，即說：「野史怎麼可靠？」我再轉告姚先生，姚先生則說：「野史中才有真史。」我對兩位長輩的看法，頗感困惑，經過仔細思考，兩人可能由於職位的不同，而導致見解互異。羅先生是國史館館長，怎麼能公開肯定野史？姚先生是學人，沒有職務上的牽絆，當然可以自由

心證。等到我在歷史圈裡摸索了若干年後，深深體會到：野史中確存有真史，但不一定全是真史！即使在大家所重視的原始檔案中，也會被攙進有意製造的假史料。引用時，都不可不慎。

## 六、轉職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52年11月1日，鳳翰兄告訴我，近史所郭廷以所長看到我在《文星》雜誌第69、70期剛發表不久的〈關於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一文，認為寫的還不錯，很想請我去近史所工作。這對我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便於11月6日下午去見羅先生，談去近史所問題，談了一個多小時，羅先生堅不放行，他再三強調：要研究近代史，珍貴史料盡在黨史會，而他也是黨史會的主任委員。可是我雖身在國史館，也不能隨便去黨史會看資料！那時各機關的史料，都奇貨可居，誰也不肯公開。當時普遍的觀念就是誰掌握了珍貴的資料，誰就是權威！11月7日上午，我再去南港見郭廷以所長，他似有難言之隱，



●與遲景德先生(左)合影(民國87年12月22日)

(陶英惠 提供)



結論是以得羅先生同意為前提。當時近史所有福特基金，待遇較一般機關好，工作亦屬單純，自然令人嚮往！另一方面，我因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在國史館無法升遷，如果當一輩子雇員，總是有點心有未甘！近史所為一學術研究單位，只看學歷及研究成績，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限制。如能到近史所工作，當可解決我所面臨的一大難題。羅、郭兩先生於11月8日見了面，談及我到近史所工作事，羅先生當面拒絕。郭先生出身中央大學，向以師禮事羅先生，尊敬備至，故不便違背師命用我，遂無可挽回。

直到53年6月，鳳翰兄告訴我近史所又有一個機會，建議我再試試看。經再三衡酌後，乃下定決心，於6月17日在國史館正式提出辭呈。24日去見羅先生，他知我辭意甚堅，無法挽留，客氣數語，允稍候即批。老輩風範，禮數十分周到。我於24日晚再去見郭廷以所長，郭先生說，當再面詢羅先生後決定。25日，羅先生批准我的辭呈。7月2日，我到南港見郭所長，正式轉至近史所工作。計在國史館三年又四十天，對館實在沒有什麼貢獻可言，回想起來殊覺慚愧！

在此我要特別一提的，就是羅館長與郭所長，都和業師吳相湘教授有些嫌隙，但都沒有將他們之間的不快，延伸到我這個晚輩身上。其泱泱大度、兼容並蓄的雅量，實在令我萬分感佩！